

喜民／著

璀璨的星系

C

C

D

X

X

在毛泽东身边
——一个秘书的回忆
周恩来与仪仗兵
卅字廊“文革”轶事
雪域神韵
写在大地上的诗行

璀璨的星系
“英雄测绘大队”的年轻人
南天群雕
生命飘出的旋律
民族艺术之宫的召唤
黄河故道走来的书法家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璀璨的星系

喜民／著

新登字(京)118号

书 名: 璀璨的星系

著 者: 喜 民

出版者: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
(邮政编码100034·电报挂号6550)

封 面: 解放军第二二〇七工厂

排版者: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激光照排室

印刷者: 北京丰台区丰华印刷厂

装订者: 北京密云水库装订厂

发行者: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 张: 7.75

插 页: 1

字 数: 166,000

版 次: 1993年2月第1版

印 次: 1993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 数: 0,001—3,000

书 号: ISBN 7-5033-0357-3/I·414

定 价: 3.80元(膜)

(如有印刷、装订差错,可向本社调换)



作者近影

作者小传

喜民，原名黄喜民，汉族，1949年底生于河南临颖一个古老小镇。1968年入伍，曾任解放军三军仪仗队队员，某部组织处处长。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1981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著有长篇纪实文学《魂系中南海》、中篇报告文学《雪域的神韵》、《写在大海的乐章》、《写在大地的诗行》及一批短篇小说。现为解放军测绘学院政治部副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目 次

在毛泽东身边	
——一个秘书的回忆	(1)
周恩来与仪仗兵	(27)
卅字廊“文革”轶事	(34)
雪域神韵	(50)
写在大地的诗行	(98)
璀璨的星系	(116)
孜孜不倦赤子心	(144)
“英雄测绘大队”的年轻人	(149)
南天群雕	(164)
生命飘出的旋律	(215)
民族艺术之宫的召唤	(219)
黄河故道走来的书法家	(233)

在毛泽东身边

——一个秘书的回忆

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共产党人的三大作风之一。凡是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同志或是读毛泽东著作的人都有一个深刻的印象：毛泽东的群众观点很强。他把群众路线看作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是根本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早在四十年代初，他就明确指出：“在我们党的一切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他又逐步把它形成一种成熟的、完整的理论形态。在他的心目中，群众是真正的“上帝”。

仲夏，一个赤日炎炎的下午，黄有凤老将军躺在病榻上，手里捧着我送给他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戴着老花镜认真地吃力地翻动着，昔日与毛泽东同志在一起的情景又一幕幕浮现在眼前……

一 红军译电员

1933年入春不久，我从红军学校毕业，组织上分配我到

政治团当干事。刚到部队感到一切都很新鲜，一天到晚和生龙活虎的战士滚在一起，觉得生活过得挺充实，时间仿佛也过得特别快，不知不觉已过了两个多月。一天早饭以后，领导把我叫到办公室说：“组织上通知，让你到瑞金附近的叶坪，去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报到，有重要任务交你去完成。”听了他的话，我瞪大眼睛疑惑地望着他不知说什么好。过了一会儿，他站起身用力往我的肩头拍了拍，朝我笑了笑说：“年轻人，祝贺你啊！”尽管他这么说，但我的心里仍直打鼓。说句实在话，刚和同志们混熟，马上又要离开，真有点舍不得。不过在战争年代那种“相见时难别亦难”的时候很多，每个同志每时每刻都可能遇上。从办公室出来，我简单地收拾了一下行李，便恋恋不舍地告别了战友，踏上了征程。

从政治团到叶坪路程不太远，不久，我便到了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办公地。一位年轻的女同志接待了我。她热情地把我迎到室内，一边上上下下打量我，一边问我是哪里人，父母亲是做什么的，本人读了几年书，哪年参加的革命，参加革命前都从事过什么工作，有什么特长和爱好，曾加入过什么党派，是否是共产党员等，问得特别详细。还当面让我写了几行字看了看。最后她给我安排了一个休息的地方，笑着说：“你在这里暂时休息休息，工作问题听候通知。”后来我才知道她叫陈琮英，是任弼时同志的夫人。组织上指定她对我进行政审和目测、考试的。

没过多久，组织上决定让我到中央人民政府机要室去工作。给我谈话的是中央秘书处的何叔衡。他中等身材，长方脸膛，待人热情，说话和气。他说：“从今日起你要到毛委员

身边工作了！”我一听，高兴得差点跳起来。自1929年2月，我的家乡江西兴国闹起了土地革命运动。穷苦人翻身了，我的家也过上了好日子。爹妈一有空就向我念叨：“咱们得感谢毛委员啊，这都是托他的福呀！”毛委员是谁？他是干什么的？他住在哪里？我能不能见见他？一连串的问号划在了我年幼的心灵上。年纪稍长一点，常听村里人讲：“毛委员在井冈山住，是咱劳苦大众的大救星呀！”1930年我参加了革命，先后担任了坝子乡行动干事会宣传干事、区组织干事和少共特委书记。那时常能听到和看到以毛委员名义签发的指示、通知、文件、布告。打那以后，我下决心好好地干，创造条件去拜见毛委员。难道这一天真的来了吗？我不敢相信何叔衡的话是真的。走上岗位后，我一连几个晚上都能梦见毛委员和我们一起。

我们机要室当年有两位二三十岁的女同志，一位是吴德峰同志的夫人戚元德，另一位就是毛委员的夫人贺子珍。那时贺子珍30岁左右，身材苗条，1.65米的个子，眉清目秀，是井冈山斗争中少有的几位巾帼英雄之一。我到机要室报到那天她们俩都刚从外地生了孩子归来。贺子珍除具有中华民族妇女的一切优良美德外，心灵手又巧。她具体负责教我搞译电，给我讲译电的基本知识，介绍干机要工作的重要性，谈她搞译电的经验体会。在她的热心帮助下，我进步很快，不久便能进行工作了。但是，“兼”、“冉”、“胥”几个字码总爱忘，后来竟成了条件反射，一见到这几个字就紧张，一紧张连翻成代码都困难。为此我心中很着急，怕完不成任务，给革命造成不应有的损失；怕给毛委员的工作添麻烦。贺子珍显然看透了我的心思，见我起急或是为难的时候总是耐心地

做我的思想工作，鼓励我树立战胜困难的信心。由于她的精心指导和耐心帮助，我很快便能独立工作啦！

那时毛委员的工作很忙，很少到室外活动。我到机要室很久了，但一次都没有见到他，心里很着急。一位老同志看透了我的心思。一天上午，那位老同志一手拿着刚收到译好的电报笑着对我说：“小伙子，快把它给毛委员送去吧！”我兴奋地朝他行了个军礼，抓起电报就往外跑。

毛委员的住地离我们的机要室很近，就在对面的一座二层楼上。我一口气跑到毛委员的办公室门口，见门是开着的，办公桌前一位身材魁梧的首长正聚精会神地看文件。我连忙收住了脚步。不知是他看累了，还是听到了我的脚步声，他抬头看见了我，并起身和我打招呼，让我进去。根据他的身材、举止、音容笑貌，我断定眼前的这位首长无疑就是毛委员了。我像个胆怯的孩子，缓缓地走进房间。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我感到手足无措，心里一阵发紧，不知道该怎么和他说话，也忘记了给他敬礼，只是手里紧紧地抓住电报不放，眼睛看着他发愣。毛委员为了解除我的窘境，叫贺子珍搬凳子出来让我坐。贺子珍应声从里屋走出来，见来人是我，忙笑着让我坐下。我不好意思坐，仍然站在原来的地方一动不动。这时，毛泽东朝我笑了笑，从我手中接过电报，也让我坐下，然后便伏在桌上认真地看电报。借这个机会，我悄悄环视了一下四周，发现这是个不太宽敞的办公室，但里面显得很整洁。家具少而简陋，只有一张办公桌、两把椅子和一个大床。床上有一床棉被和一条军用毛毯。桌子上面堆放了报纸文件和书籍，还有一盏带玻璃罩子的煤油灯。墙上还挂着一把油纸伞。

毛泽东看完电报，抬起头来，亲切地问我：“你是新来的吧？哪里人？叫什么名呀？”他的热情使我的紧张心理释解了。我对他的提问一一作了认真回答。他燃上一支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口，又把它吐出来，袅袅的青烟弥漫着。他认真地听完我的回答，点点头，和蔼地对我说：“好啊！你上过学，种过地，还当过竹筏子工人，也是工人阶级喽。”听了他的话，我笑着点点头。接着他又问道：“你乐意不乐意干机要工作？”一时我有点噤嘴：“愿是愿意，就是文化水平低，念的书少，怕做不好。”他说：“文化水平低不要紧，那是暂时的，可以在革命队伍里学习嘛。”他又吸了口香烟，幽默地说：“我可以当个先生，不收你的学费，愿意吗？”听了毛委员的话，我心里热乎乎的，心想：有这么一位好老师，我一定好好学习。

当时，由于革命形势发展迅猛，全国各地都需要干部，所以机要室的同志流动得很快。我做译电员不久，室里的几位老同志都先后奔赴新的战斗岗位了。虽说我新来乍到不久，但老同志一走，我自然成为一位年轻的“老同志”了。尽管称得上“老同志”，但工作能力、译电的水平还不够高，工作中仍碰到不少困难，还常有译错的地方。记得有这么一次，我译完一份电报便匆匆给毛委员送去。我见他手头的事情很多，简单汇报一下情况，扭头便往回返。谁知刚走不远，他便把我叫住：“黄有凤，你过来，这里有几个字可能译得不对吧？”我返回身，脸上觉得火辣辣的。我担心发生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我站在他的身边，像个做错事的孩子。他一只手拿过电报稿，一只手指着我译错的字，说：“你回去再查一查。”说心里话，译的时候就有个字就有点吃不准，回去一校对，果然弄错了，心里很难过。我羞赧地站在毛泽东的办公桌前给

他认错，等待着挨克。他见我情绪不好，起身走到我身旁，用他那张宽大的手抚摸着我的肩头，十分认真地对我讲：“我们的工作关系到革命的成败和千百万人的生命，可不能有半点马虎，要慎之又慎才行啊！”他的言辞虽不激烈，声调也不高，表情也不严厉，但字字句句都深深地打动了。以后在我近五十年的机要工作中，我始终把毛泽东同志的那段谆谆教导作为座右铭，鞭策我在革命的征程中不断取得新的成绩。

打那以后，我一有空就背密码，苦练基本功。为了使机要工作适应瞬息万变的战争形势，组织上要求每一个机要人员必须尽快具备记得快、忘得快的素质。为了提高我的文化水平和工作能力，不久，毛泽东同志又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把一本同音字典送给了我。他见我不会查字典，就手把手地教我，并经常给我讲解一些生词的意思，直到我完全弄懂了才肯罢休。后来，他还多次告诉我：文化水平高了，工作质量也就能相应提高。为使我做好机要工作，他还多次指示我：“要注意留心每份电报的内容中心，先抓住最重要、最紧急的问题汇报。为了不失战机，保证指挥顺畅，一定要做到准确、迅速、保密。”

毛泽东在工作上关心同志方面是个极为认真和细心的人。无论是在瑞金、长征途中、陕北，还是在中南海，他始终保持着这些优良作风。我在他身边工作的日子里，他不仅教我查校电报，还经常把我们送去的电报稿子加上标点符号，供我们学习参考。一天晚上，我正专心致志地伏在煤油灯下练习写字，他悄悄地来到我身边。因为我在学习，没察觉到他的到来，仍低头练我的字。他在我身边默默站了好一阵，我才发现他。我马上站起来。他微笑着说：“我来看看你。打搅

你学习啦。”说着，信手把我的本子拿去看。他从头至尾认真翻了一遍，连声说“不错”，还称赞我进步很大，然后他指着一个错字说：“你瞧瞧，这个字是不是写错了？怎么多长出一点呀！”说着，他拿起笔，给我写了一个样子，让我照写几遍，直到我写熟了，他才高兴地离去。由于毛泽东同志的关心和帮助，我的文化水平和工作能力提高很快，工作起来顺手多啦，经常受到组织和领导的嘉奖。

毛泽东同志对他自己的学习总是抓得很紧。他在长征途中，有一次因随身带的书看完了，到一个村子驻扎后，他对警卫员讲：“你去给我弄部‘水浒’和‘三国’来。”警卫员愉快地接受了任务，高高兴兴地进了村，找到一户读书人，说要借个“水壶”和“仨锅”用。老先生看了看他，知道他是为穷人打天下的红军，就把自己正用的水壶借给了他，并说家中没有三口锅，只有一口，自家每天都得用，实在腾不出来。警卫员谢过老先生，提起借来的水壶兴奋地去见毛泽东，一进门就说：“主席，水壶拿来了，仨锅没找到。”毛泽东抬头一看，禁不住笑了。他把警卫员叫到身边，耐心地告诉他：“我要的不是烧水的水壶，也不是烧饭的大锅，而是中国的古代名著《水浒》和《三国演义》。这是两部古书。”说罢，又拿来一片纸在上面写出来，交给了警卫员，告诉他今后注意抓紧时间学习，干革命可不能闹笑话呀！那天因警卫员没有借到书，主席晚上自然看不到了，只好做其它事去，要不然又得熬到大半夜。

由于毛泽东同志的谆谆教导，我们这些土生土长的年轻人，很快成长为坚强的红军战士、党的忠实的机要干部。

二 在毛泽东的担架上

革命胜利以后，我每次到毛泽东主席家作客，总会自然而然地想起当年坐主席担架的事。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蒋介石先后向我革命根据地发动了四次反革命大围剿，每次都以失败而告终，但他并不甘心失败，在“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口号下，经过六七个月的准备，于1933年9月，调集了一百万军队，二百架飞机，又丧心病狂地向我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反革命大“围剿”。我们有了前几次的斗争经验，再加上中央红军已发展到十万余人，取得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是可能的。但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执行者推行了完全背离毛泽东战略战术思想的方针，结果使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了。1934年10月，红一方面军的主力不得不退出中央根据地，实行战略大转移——长征。

起初，我在红军总参谋部一局作战室当作战见习参谋，室里还有罗舜初、黄鹄显和孔石泉（当时叫孔石苏）几位老参谋。那时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每天轮流督促各部队尽快转移，疏通前进的道路。

1935年遵义会议后的2月，组织上把我从作战室调到毛泽东主席身边当机要秘书，负责保收电报、文件和地图。那时，除了行军、休整，就是与敌人作战。毛泽东同志在党内红军内的主要领导地位确立后，他的精神很好，每次行军休息时都找周恩来、洛甫、王稼祥几位领导碰头，研究情况，还常常亲自到队伍前头去了解敌情；晚上也闲不住，不是开会，

就是批阅文电、看书学习，经常通宵达旦，日子长了，他的身体一天比一天消瘦了。我们这些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见了心里很着急。组织上听说后，决定给毛泽东同志派一副担架，抽调了几位身体壮的同志组成了一个担架班。但是，毛泽东无论多困多乏，道路多么崎岖难行，他很少用。若是哪位同志负了伤，或是得了病，他就主动把伤病员扶上担架，或推上他那匹心爱的坐骑小黄马，他自己却手持棍杖，跟在担架后面或走在马的旁边前进。

同年6月，我们已离开中央苏区八个多月了。在这半年多中，我们的党，我们的红军乃至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受了許多意想不到的磨难，但也正是在这难以计算的磨难中锻炼了意志，增长了才干，一天天地壮大、成熟起来。但这都是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啊！在这半个月前，我第四团二连以廖大珠连长为首的22名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冒着敌人密集的火力，胜利抢占了泸定桥，为中央红军北上打开了道路。毛泽东同志过桥那天，我和警卫班的同志紧围在他的四周，正要上桥，敌人的飞机就来了，对准桥面就扫射。我们急忙去掩护主席。就在这时，有好几颗炸弹在我们不远的地方炸开了。硝烟散去，大家从地上爬起来，抖掉盖在身上的沙土准备继续前进。这时我们突然发现警卫班胡班长倒在血泊中。同志们跑上去抱住他拼命地喊：“胡班长！你醒醒！”“胡班长，你醒醒！”过了好一阵，他才吃力地睁开眼，看了看大家，就永远离开了我们。同志们围在他的遗体旁，哭喊着他的名字，悲痛极了。毛泽东同志也走了过来，站在胡班长的遗体前，也悲痛地掉下了眼泪。同志们说主席从不掉泪，在他身边工作多年，那是见他唯一掉泪的一次。后来，毛泽东同志和我们

一起用小铁锹为烈士挖了个坑，把他掩埋在了泸定桥畔。盖好土后，毛泽东同志向胡班长的墓堆行了个鞠躬礼，才难过地上了路。

由于连续的长途跋涉、作战和敌人的骚扰，许多同志的身体状况很不好。我也渐渐感到体力不支。快到四川懋功的那天，我觉得两腿发软，四肢无力，忽冷忽热，浑身颤抖，眼冒金花，两条腿像灌铅一般，一点都不想抬动，每前进一步都得付出吃奶的劲。我真想躺在草地上痛痛快快地睡上一觉，哪怕是昏死过去也乐意，但不能啊！因为部队在前进，毛泽东同志在前进。我紧咬牙关，紧紧地跟在毛泽东身后，艰难地一步步向前挪动，终于坚持到了宿营地。

次日天一发亮，前进的号角又吹响了。我强打精神站起身，忽觉头重脚轻，身体轻飘飘的，犹如坠入了五里烟云，脚不听使唤了，摇摇晃晃像个醉汉。没走多远，浑身上下直冒汗，不大一会儿工夫帽子和衣服都浸湿了。我怕毛泽东同志和大伙看到，仍一声不吭地坚持往前走。刚一迈腿，身子趔趄，险些跌倒，我急忙止住脚步，抹了把额头的汗，张着大口直喘粗气。毛泽东同志见我这个样子，问道：“黄参谋你怎么了？”我一听，糟了，主席肯定发现我病了。这怎么办呢？自长征以来，他的事情太多了，无论党内的、军内的，他都得管，他身上的担子太重了。我们都想为他分担一点，都希望他能保养好身体，好指挥千军万马度过难关去迎接新的胜利！我们每一个同志都不想因自己的事情去分他的心啊！因为他是我们工农红军的希望啊！听了主席的问话，我就连忙说：“没有什么，脚下踩空了。”还故作掩饰地大步向前走去。没走几步，胳膊便被一只有力的大手紧紧抓住。我定神一看，

是毛泽东主席。他轻轻地摸了摸我的额头，一双有神的大眼紧紧盯着我，仿佛责备我不该“欺骗”他。他叫来警卫员照顾我坐下，然后又让卫生员小钟给我好好检查。小钟认真看了看，吃惊地给毛泽东主席说我得的是疟疾，病情很重。他叫小钟马上给我服药，并拿来水壶让我尽早吃下。红军的药品本来就少，长征以来就更少了，所以，同志们病了一般是不吃药的，即使病情严重，也是很少吃药的。小钟把药递给我，我执意不肯接。主席看我推辞，马上变得很严肃，把水壶塞给我，示意我立即把药吃下。无奈何我把药吞下去，接过水壶，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扑簌簌掉了下来。吃罢药，我二话没说，拔腿就往前走。谁知毛泽东把手一伸，又把我拦住了。他把担架班长丁良襄叫过来，告诉他快把担架抬来。我一看急了，就朝他嚷嚷：“主席，我的病不重。我完全可以自己走啊！”他根本不听我的辩解，用手拉着我，说：“你可不能再逞能了，脸都烧得通红了。”没容我再说什么，便将我扶上了担架。他怕我着凉，还亲手把他那床灰色军用毯子盖在我的身上，并亲切地对我说：“好好养病，过些日子准备参加一、四方面军的大会师哟！”担架从地上抬起来，毛泽东又叮嘱担架班长小丁，路上注意照顾好我。

随着担架员整齐的步伐，担架在有规律的颤抖中前进。我的心也很不平静，也伴随着担架的颤抖而颤抖。我睁开眼，泪水顺着眼角流下来。我曾想竭力控制住自己，但无论如何也控制不住泪水的闸门，情感的闸门。我用被角擦了擦泪水，睁开眼望着无垠的苍穹，注视着飞逝的流云，心里想了许许多多。10岁那年，因家境贫寒，我弃学务农，地主把我当牛马使，不是下田劳动，就得上山放牛；再大一点，就给有钱人